



2001年2月8日，中国京剧院在台北国父纪念馆舞台演出《红灯记》。看戏之前，我刚好遇见批准这次来台演出的台湾最高教育主管曾志朗。曾志朗听说我当晚要去看《红灯记》，很高兴地说，“好看啊。不过他们对台湾不太了解，为了‘体贴’我们，把台词都改成‘革命党’三个字，说是不要‘刺激’我们；我就批示，根本不需要。共产党就共产党嘛，什么时代了。”

当晚，我邀了三个80岁的长辈一起去看戏：在大陆当过国民党宪兵连长的父亲，浙江淳安县绸缎庄出身的母亲，还有方伯伯，他在17岁那年跟着蒋介石从奉化溪口走出来，千山万水相随，做了一辈子“老总统”的贴身侍卫。

国父纪念馆有三千个座位，不是特别有号召力的表演，一般不容易坐满。

红色的地毡，被水晶灯照亮了。时间一到，所有的门被关上。我回头看，3000个位子，全部坐满，一个空位都没有。这是首演。灯暗下，没有手机响，也没人交头接耳。台北人很文明、很安静地看演员如何用唱腔歌颂共产党的伟大和个人的牺牲。

我偷偷用眼角看身边三个老人家：父亲特别入戏，悲惨时老泪纵横。方伯伯一脸凝重，神情黯然。母亲一脸怒容，从头到尾，一言不发。

演出结束，很长的掌声。我们坐在第一排，看着人群从面前流过，七嘴八舌地评戏。一个头特别大的老人家大声说，“告诉你，李登辉就是鸠山！”旁边的人哄然大笑。父亲很高兴地说，“日本鬼子太坏了！这个戏演得好！”日本才是敌人，这戏里的英雄好汉是共产党，他浑然不觉得有任何不妥。

母亲在一旁一听父亲的剧评，真的生气了，冲着他说，“我不知道台湾政府是干什么的，让这种戏也来演是什么意思。它歌颂的是共产党你晓不晓得？”然后她带点埋怨地瞅着我，“不晓得你带我来看的是这种戏？”

方伯伯必事重重，慢慢地说，“1975年，老总统遗体的瞻仰仪式就在这个大厅举行的，26年来，我第一次再踏入这个大厅，却是看这《红灯记》……他的遗体，就放在台上，李玉和唱‘为革命同献出忠心赤胆’的地方……”他说不下去了。

那天晚上，有3000人去看《红灯记》，有的人，譬如我的父亲，被民族情感感动得涕泗滂沱。有的人，譬如我母亲，国共内战所撕开的伤口在60年后都还淌着血。有的人，譬如方伯伯，无法接受政治的翻天覆地。

(龙应台)



腐败没有遇到 文化上的抵抗

和那些动辄成百万、上千万乃至过亿元地捞钱的“鲸吞式”贪官不同，山西省交通征费稽查局晋中分局党委书记邓军生的受贿方式是“蚕食”：“他几乎不能容忍任何一次自费消费”，老婆治疗近视眼、购买皮大衣、夫妻赴京旅游等等鸡毛蒜皮的花销，他都要想法设法让公家报销。经过长达10年坚持不懈的努力，他居然集腋成裘、聚沙成塔地把自己变成了一个同时犯有受贿罪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腐败明星”！

最耐人寻味的是，邓的腐败可以说是在“阳光”下进行的：整个系统的人都知道他喜欢让人报销个人花销。其一位下级这样向记者诉苦：“邓书记一说到哪儿检查工作，大伙儿都想躲。实在躲不过，就硬着头皮自掏腰包，给邓书记

报销。我们都奇怪，老邓身上怎么有那么多发票？好像永远也报不完。”而没有一个人意识到这是一种索贿、受贿的行为。最让人感到奇怪的：甚至连“邓书记”自己也没有意识到已经犯了重罪——在罪行已经被完全揭露之后，他还一脸天真烂漫地问：“什么时候放我回家？”

邓的经历，证实了这样一个绝非危言耸听的判断：腐败没有遇到文化上的抵抗！所谓文化，就是指一种存在于社会中普遍信仰的和共同遵守的规范及惯例。邓之所以能够通过“蚕食”，把自己炼成“腐败明星”，是由于他生活在一个“规范及惯例”都对腐败行为格外宽容的文化氛围中。周围人对邓的行为虽有不满，但也都用行动默认他用公款报销自己私人花销的要求。

(郭松民)